

邦兴何求

中国近代外交人物周旋曲程

王大文 著

白山出版社

邦兴何求

中国近代外交人物周旋曲程

王大文 著

白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邦兴何求——中国近代外交人物周旋曲程 / 王大文著. —沈阳: 白山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5529-0833-6

I. 邦… II. ①王… III. 外交史—中国—1875~1949 IV. ①D8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69172号

出版发行: 白山出版社

地 址: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

邮 编: 110013

发行电话: 024—28888938

电子信箱: baishan867@163.com

责任编辑: 林向阳

装帧设计: 战 旗

封面题字: 高 昆

责任校对: 王 实

印 刷: 东煤地质局沈阳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印 张: 31.5

字 数: 390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29-0833-6

定 价: 62.00元

目 录

第一章 中国近代外交的先驱者——郭嵩焘 / 1

奉召入京 / 2

起航前的风波 / 7

远洋西方 / 10

首任驻英法公使 / 12

体验西欧文明 / 23

孤愤辞职与那个无奈的时代 / 27

第二章 第一个敢说“不”的外交官——曾纪泽 / 31

奉诏入宫觐见慈禧 / 31

边境烽烟起 / 33

“黑色”的里瓦几亚 / 36

受命于危难之际 / 40

虎口夺食 / 42

保藩固疆之殒 / 51

第三章 戴着瓜皮帽的外交官——何如璋 / 61

出使扶桑 / 61

虎弱被犬欺 / 68

蒙昧误事 / 75

第四章 乱世中的外交诗人——黄遵宪 / 78

随槎万里赋东征 / 78

吟到中华以外天 / 84

东西南北转蓬身 / 89

第五章 清王朝的新式外交官——伍廷芳 / 105

初次出使美国 / 105

第八任驻美公使 / 118

新世纪来临前夕 / 127

民国外交总长 / 143

护法军政府的外交总长 / 150

第六章 皈依上帝的书卷外交官——陆征祥 / 159

京师同文馆里的高才生 / 160

风雨圣彼得堡 / 162

首任民国外交总长 / 176

参与中俄外蒙古问题谈判 / 182

主持中日“二十一条”谈判 / 189

重返政治舞台 / 194

出席巴黎和会 / 200

第七章 北洋外交的领军人——颜惠庆 / 211

不得意的晚清“洋进士” / 211

回国入阁参政 / 226

遥控华盛顿会议 / 235

在红色的国度里 / 250

投向人民的怀抱 / 258

第八章 民国第一外交家——顾维钧 / 267

- 步入外交界 / 267
-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 / 277
- 黑暗内政下的外交 / 287
- 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 / 296
- 难忘那伦敦的日子 / 310
- 重返华盛顿 / 321
- 外交生涯的结束 / 329

第九章 中国体育外交的先驱——王正廷 / 340

- 护法运动的前前后后 / 340
- 折冲京华 / 346
- 开辟民国外交的“新纪元” / 358
- 绿茵场上的风云 / 380

第十章 民国外交强人——陈友仁 / 387

- 孙中山的挚友 / 387
- “陈友仁时代” / 397
-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 / 404
- 三任外交部长 / 410

第十一章 清末民初的外交名宿——唐绍仪 / 423

- 清末对外交涉重臣 / 423
- 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/ 438
- 抉择在民族大义与政治抱负之间 / 450

第十二章 蒋家王朝的外交砥柱——宋子文 / 460

出访欧美 / 46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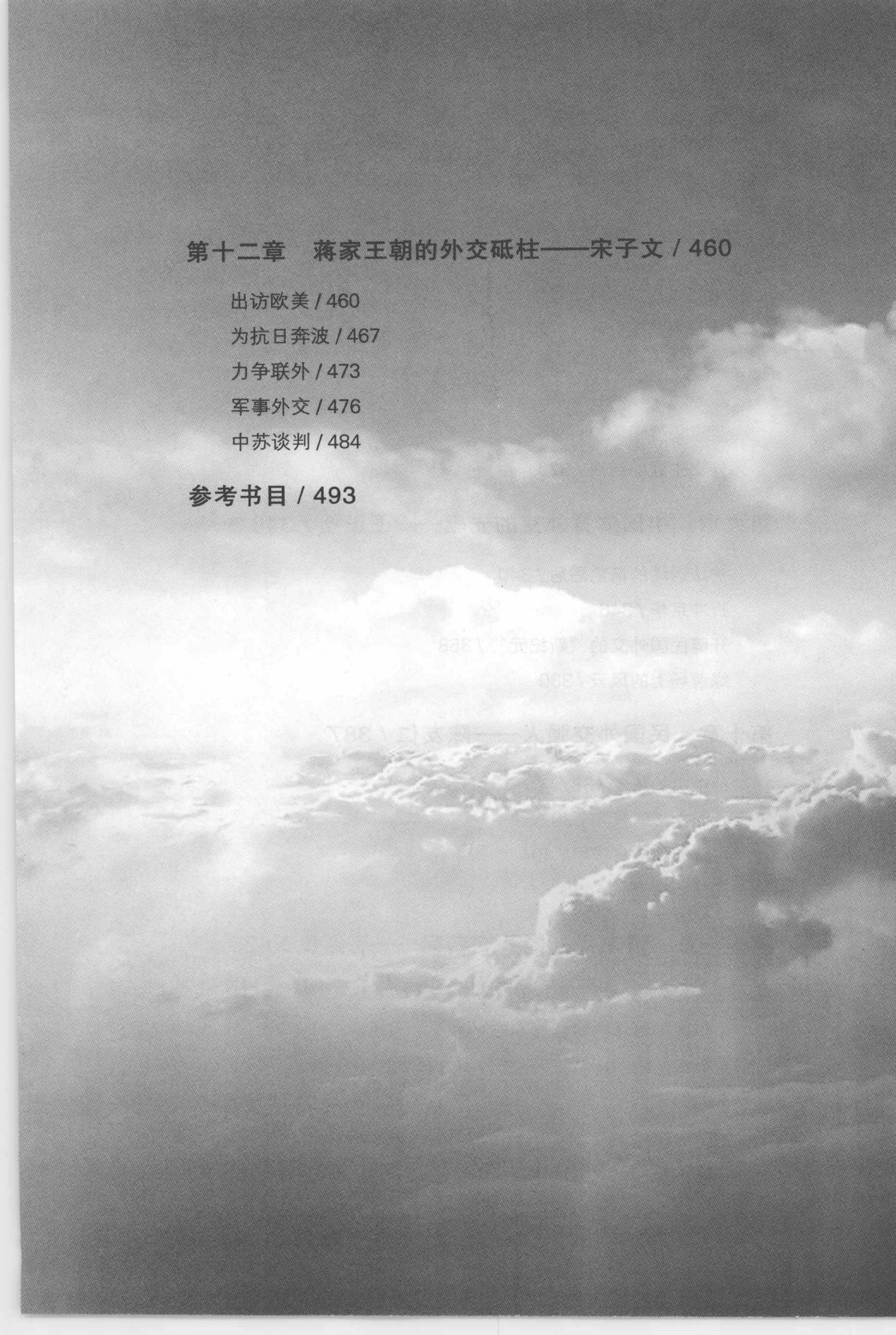
为抗日奔波 / 467

力争联外 / 473

军事外交 / 476

中苏谈判 / 484

参考书目 / 493



第一章 中国近代外交的先驱者——郭嵩焘

19世纪30年代，在中国正是清道光朝时期，清朝在关内建立政权到此时已近200年。清王朝从这时开始由康乾盛世，逐渐走向了衰落。翻开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，清王朝由鼎盛走向衰败是必然的。如果是一帧画卷的话，它给人们呈现出这样两幅画面：

一幅展现的是国内。清王朝统治阶级，对广大人民一直实行着残酷的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。特别是自18世纪末（乾隆朝末叶）以来，统治阶级愈加骄逸腐化，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黑暗，整个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陷于瘫痪的状态。在封建统治的重重压迫和束缚之下，中国经济停滞不前，人民生活十分困苦。所以从19世纪初叶起，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连绵不断，清朝统治者面临着日益加深的危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为了巩固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，担心外来势力和国内人民革命力量相结合来反对自己，对外更加坚决地执行闭关政策。1835年，两广总督卢坤等制定了《防范夷人章程》8条，重申对外禁例，加强闭关政策的实施。

另一幅展现的是国外。19世纪30年代的西方世界正处于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。这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英国、法国和美国，而尤以英国最为发达。自18世纪中叶“产业革命”以后，英国的工业生产高



速发展，到19世纪30年代几乎占有了全世界工业产量的一半。随着机械化生产的发展，生产“过剩”的危机不可避免。各资本主义国家迫切要求扩大国外市场，以便为他们的“过剩”产品寻找出路。

就是在这两幅画面重叠的情况下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到东方的弱小国家寻找市场，中国便是他们的首要目标。以输出鸦片为标志，西方列强开始疯狂掠夺中国财富。1840年和1842年两次鸦片战争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，打开了中国紧锁的大门。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国内人民的强烈反抗，清朝政府一时惊慌失措，拿不出具体的解决办法。国内硝烟四起，四处告急。不了解世界又不懂外交事务的清朝政府，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和西方列强的要求，于1861年1月，设置了第一个专掌外交的机构，称为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”，才开始战战兢兢地与西方进行外交往来。郭嵩焘就是这时清朝出使西方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常驻公使。

奉召入京

1874年2月，日本借口台湾居民杀害遇难琉球渔民，兴师进犯，3月登陆恒春，进攻番社。清廷遂于4月任命沈葆楨为钦差大臣，赶赴台湾办理此事。并于5月命令沿海各省积极设防，又于6月初八诏命郭嵩焘、杨岳斌、曾国荃、丁日昌、鲍超、蒋益澧来京陛见。可见当时国家正处于危急关头，急需召集才干能吏赴京商议。此事既涉外交，更需征求熟悉洋务人士的意见。

郭嵩焘，湖南湘阴人，字伯琛，号筠仙，进士点翰林，入值南书房行走，曾担任过苏松粮道、两淮盐运使、署理广东巡抚、诏受福建按察使。

郭嵩焘曾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，同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，并屡有

战功，深得曾国藩的倚重。他第一次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和比较系统地接触西方事物，是在1856年。这年年初，他曾奉曾国藩之命，赴江浙为湘军筹款。这年的正月二十五，他在杭州曾与浙江著名学者邵位西讨论“西洋测天之略”。他对自己最近在西洋读物上看到的“日心说”颇为怀疑。在和邵位西充分交换了各自看法之后，郭嵩焘似乎豁然开朗，喜悦之情无以言表。2月初五他来到上海，初七他参观了位于洋泾浜的法国人办的利名、泰兴两处洋行，看到了价格极其昂贵的风雨表和双眼千里镜。接着他又参观了领事馆的一处洋楼，他在日记中不仅详细记录了房屋的结构和陈设，甚至记录了领事馆洋人女子的生活习惯，以及在回船路上遇到的两个“秀美”的夷人小儿。初九，他在英人陪同下前往参观火轮船，全面听取了英国副领事对轮船的结构、各主要部件的作用以及工作原理的介绍。他在记述中还不厌其烦地描述了洋人款待的酒食，即便是悬在轮船两旁随风摇摆的西洋吊床，也没有逃过郭嵩焘的眼睛。最后他还考察了由西洋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，并由此结识了著名科学家李善兰、王韬等人，找到了西人所撰《数学启蒙》和西人刊行的新闻报纸《遐迩贯珍》数部。在那里，郭嵩焘还第一次看到了印刷机及其工作的情况，情不自禁地赞叹“西人举动，务为巧妙如此”。短暂的上海之行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虚心求教的态度表明了他对西洋器物的赞赏。此后，1858年9月至11月间，郭嵩焘多次与友人何秋涛讨论俄罗斯史地，并向其索要论著《朔方备乘》仔细赏读；同年9月25日，郭嵩焘在日记中还特别提到了魏源《海国图志》近增100卷，以及详细介绍西洋制器之法的两本新书：俞正燮的《癸巳类稿》和邓复光的《镜镜诠痴》。1862年，郭嵩焘在上海、广东等地，继续接触西人、西学。他曾与李鸿章侃侃而谈，议论军事方略。他说自己在英国军官身上，看到了西洋也大有人才在；他从英法联军联合进攻嘉定太平

军，顷刻拿下的战况，感到了洋人兵精器利，是为忧患；他在“得利洋行”第一次看到了加工小麦的“火轮磨”和所谓“传书铁线”的电报，禁不住赞叹真是巧夺天工，称雄中国。

那时，郭嵩焘知晓洋务，在京城早已闻名，这次在诏命之列，并不意外。1875年2月6日前，郭嵩焘到达了北京。他此次应诏入京，按照惯例应尽快赴宫门请安，然而此时正值同治皇帝新丧，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宝鋆认为，他应该在新丧百日后再去请安。但郭嵩焘同年进士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沈桂芬，则认为请安不宜缓。郭嵩焘于是在元月初九入东华门，先至九卿朝方小坐，然后由一杨姓“苏拉”（秘书）引郭嵩焘到内务府朝房，见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、宝鋆、沈桂芬、李鸿藻等人。见后仍回九卿朝房。然后六额驸景寿引他入月华苑，到内朝房小坐。这时，内侍传恭亲王让郭嵩焘到军机处相见。郭嵩焘到了之后，恭亲王说郭嵩焘乃南书房旧人，不必拘礼，遂问郭嵩焘家庭情况，并称赞郭嵩焘熟知洋务，向宝鋆、沈桂芬二人说：“此人洋务实是精透。”之后，再由六额驸引领至养心殿，内侍掀东屋帘，入内跪安，在席边见到坐在御榻上的4岁小皇帝——光绪。御榻的两边以及前方都有青布覆盖的小桌子相护。榻后垂帘，坐着两位太后。慈禧太后问他在外几年，在广东几年，在路上是否遇到雪，以及地方上是否安静，等等。又问他曾在京城当何差使，是否因病回家，今年几岁，等等。问答之后，退到外朝房告辞退出。第二天，郭嵩焘又与恭亲王谈了很久。又一日，他见到文祥，在室内谈了2个多小时。威望甚高的文祥对他极为推重。当时恭亲王与文祥同为总理衙门的重臣，主管洋务，而都推崇郭嵩焘之“洋务精透”。这次招他来京，除了李鸿章外，当然还有此两公的意思。

1875年的正月二十，光绪皇帝正式登基。郭嵩焘和曾国荃等入东华门，先到九卿朝房等候，而后到太和殿参加庆典。自2月起他见了

不少洋人。初三，到总税务司赫德处谈，又顺路造访了同文馆教习丁韪良。初六，与曾国荃一起见了英国公使威妥马。初七，与曾国荃前往见美国公使，谈及美国独立100年庆典之事。这些迹象都表明，郭嵩焘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，留在京师办理洋务。李鸿章在正月初十致郭嵩焘函中，也认为他将“跻总署一席”，并指出以嵩焘的性格，任京官或外交官为宜。但是，2月初九得知诏授福建按察使。6天之后，曾国荃诏授陕西巡抚，2人均未授京官。

当时恭亲王与文祥正筹议海防，福建为海防重地，日本侵台事件刚过，所以沈葆楨力主经营台湾，并有闽抚驻台的主张。派郭嵩焘赴闽，正是要依赖他能办洋务的能力。郭嵩焘知道廷上的意思，所以在赴台之前，上了《条议海防事宜》一折，畅舒己见。除战术意见外，更提出卓越的战略建议。他认为，西洋各国东来，旨在图谋商利，不一定喜欢打仗，更不想因战争而妨碍商业利益。因此，他建议鼓励中国的商贾造船、制器、贸易，发达商人资本，以与洋人争利，并巩固中国的利权与海防。如果仅由官方筹防，不得商贾的合作，不通官商之情，不究公私之利，根本无以防海。此外，他又提出本末问题，像海防与边防都是末，而兴政教、明吏治才是本；自强是末而自立才是本。他引总税务司赫德之语，谓内事与外防为两大要事，内政弱，外交无以强，故内政是“本”，而外交是“末”。此一条陈送呈总理衙门后，总署大臣奕訢等认为“语有可采”，于“中外情形，他的有体会，绝非空言”，应归入五大臣和其他各奏章之内，“恭呈御览。”

郭嵩焘于1875年5月2日离京，4月13日自天津搭海轮赴上海，5月初抵达福州。然而，郭嵩焘被派往福建仅2个月，又“命令即速交接工作起程北上”。原来是滇案难办，召他回京商议。

滇案发生于1875元年2月，为了修筑一条由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，1874年，英国上校军官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近200人，从缅甸出

发，探测到我国云南的路线；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官马嘉理，也奉公使威妥玛之命，从北京经云南到缅甸接应，准备年底与柏郎在八莫会合。1875年2月，马嘉理和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不事先通知地方官员，就擅自闯入云南，并扬言要进攻腾越城（今腾冲），曼允山寨的景颇族人民力阻英国侵略者通过。正月十六，马嘉理向当地群众开枪逞凶，群众义愤填膺，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的中国人打死，并把探路队赶回缅甸，这就是“马嘉理事件”，又称“云南事件”或“滇案”。同年2月，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，说是由云南巡抚岑毓英主使下，才发生了“滇案”。在英国的压力下，清廷于5月中旬，命湖广总督李瀚章前往云南查办，并由李鸿章与英使在天津交涉。7月中旬，威妥玛提出六项要求，包括派员赴英通好谢罪。于是李鸿章上奏，以郭嵩焘明通外情，在粤任期与英人颇有交往，又在赴闽前曾与威妥玛见过面。这样就在七月底，朝廷请诏郭嵩焘回京，并任命为侍郎候补。总理衙门的恭亲王，于1875年8月29日照会英使，说将派郭嵩焘等出使英国。

当时，郭嵩焘在福州，由李鸿章函告，并转达了总署的信函，要他“早日命驾北来，面商一切”。李鸿章函中提到，威妥玛调集兵船，对我恫吓，望你速来协商，设法挽回。可以看出招郭嵩焘回京，不仅为了出使，而且借重他与英国人交涉，以排忧解难。

郭嵩焘奉旨搭乘“济安”号轮船离闽，于9月11日抵达上海。两天之后，上海英国领事麦华佗照会各国领事衙门后，来与郭嵩焘行“宾主相见之礼”。其他各国领事也到船上拜访，郭嵩焘一一答拜。18日自沪起航北上，于22日到达天津。

郭嵩焘抵津后，见到李鸿章以及淮军洋教习马格里。马格里精通中文，答应充当郭嵩焘出洋期间的英文参赞。并立即约见英使威妥玛，同时发了公函。此公函有礼而得体。自滇案发生以后，英使威妥

玛一再要求在行文上“大英”与“大清”并列，并将“大英国”字样抬头书写以示尊重。清廷已不敢轻慢英国，只是旧体制一时难改，而郭嵩焘此函可说是得风气之先，充分表现两国平行的新式外交格局。遗憾的是郭嵩焘以礼相待，而威妥玛竟傲不作复，有失西方的礼仪。两人相见最后是在李鸿章总督的座上，已是1875年11月24日的事了。

威妥玛先是催派中国使节赴英，后又改口说等滇案解决，再行派遣，所以行期一时难以确定。同年11月初四，朝廷又诏授郭嵩焘为兵部侍郎，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他在走马上任之前，先上一折，直言滇案难结的根本原因，就是中国并没有以礼对待外国，而我们有些官吏又不懂外国人生活习惯和思想理念，满足自己高谈阔论，更不知向西洋学习“强兵富国之术，尚学兴艺之方”，反加诋毁，以至于屡生事端，穷于应付。他毫不忌讳地说，滇案由于岑毓英有意袒护肇事者，不查明情由，据实奏报，因此给英方造成了口实。应当将岑毓英交部严加议处，“以服洋人之心。”他认为封疆大吏于中外交涉事宜，不能事先预防，以致造成衅端，例应议处；何况议处岑毓英，英国人便无所要挟，在外交上做到有理、有利、有节，以平息风波。

郭嵩焘虽就事论事，但此论一出，引起了各方非难。当时朝廷明显偏袒岑毓英，而他居然要求严加议处，于是就有人说郭嵩焘“事事依附英人”，没有骨气。遭了到朝廷一些人的强烈反对。而此时他又有出使英国之命，更被人视为辱国之举。群情激荡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这样，郭嵩焘就成为了众矢之的，交相攻讦，使他百口难辩，唯有忍辱负重。

起航前的风波

郭嵩焘虽已有出使英国之命，由于一时行程难以确定，暂时以兵

部侍郎入值总署，然而，由于出使以及参劾岑毓英，成为朝野士子攻击的目标，即使好友也没有办法为他解说。

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因为不满清廷对滇案的态度，拒绝与奉命使英的郭嵩焘相见，双方无法商量出使事宜。郭嵩焘只好于1875年11月底，来到总税务司赫德处，探询英方意见。赫德认为应该尽早出使赴英，滇案即使一时难以解决，也不应该等解决后再启程；何况出使并不全都因为滇案，英国有中国的公使，才能随时处理两国的事务。赫德说，英国对华并无领土要求，只求双方互惠。

之后，郭嵩焘力请英国使馆的汉文正使梅辉立安排与威妥玛直接晤谈。12月初，威妥玛居然登郭嵩焘之门造访，因郭外出没有见到，郭嵩焘马上回函致歉，并定于12月12日回拜。有此突破，郭嵩焘略感欣慰。见面之后，威妥玛对郭嵩焘印象不错，对郭嵩焘的见解也有深一层了解，他积极支持郭嵩焘早日出使。

1876年3月4日，郭嵩焘在兵部值日时，突然接到太后召见的通知，由奕劻带见。太后颇关心与外国交涉事宜。她问及滇案，更忧虑日本在朝鲜寻衅。郭嵩焘说，日本正在学习西法，意在兼并，而西洋各国逼高丽通商，未尝不暗中怂恿日本。至于应变之道，他重复了以前的主张，认为外国意在通商牟利，中国不可先存猜疑之心，必须应付得法，轻易不要动武。动武一回就伤一回元气。要应付得法，先要审时度势，然后随机应变，以理争之、折之。他进而解释洋人的脾性，认为洋人好胜，办事快便，辩论有方法。若能知彼，未尝不能使他们就范。太后固然甚是关心夷务外交，却未必真能领会郭嵩焘的睿智卓识。

同月21日，郭嵩焘在总署目睹了威妥玛逼人的气焰，而署中诸公唯唯诺诺，不敢言辩。清廷充斥着这种背后骂洋人，而当面又怕洋人的无能官员，使郭嵩焘感到气短，不免产生了消极情绪。

外有英使的凶狠，内又有同僚的毁谤。郭嵩焘的情绪十分低落，精神上的刺激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，以致身心俱疲，于是决心引退。这次不是称病，而是真的病了，威妥玛还派英国医生官来看病。但沈桂芬、文祥等人知无人可代替郭嵩焘出使，坚决不允许辞职，只是给了病假。3月21日假满，又续10日。10日之后，他仍然决心引退，并上奏请假回老家调理。4月初二上谕再赏假1个月，不需要回到原籍，总署的官员们也刻意慰留。郭嵩焘知道脱不了身，于是继续留任。

不过，郭嵩焘并未放弃坚辞的决心。他不仅因久病不愈，苦苦思归；而且士论大哗，使他感到无所作为，自觉心灰意冷，就于1876年再度上疏请求回籍。初二即奉谕再赏2个月调理，仍然不准回籍。6月初一，他上书沈桂芬，竭力陈述自己回家的想法。次日晚上接到谕旨，准他开缺总理衙门的职务，但仍须留京听候出洋。7月初五，郭嵩焘再度上奏，全力求退，但这次开缺兵部左侍郎署缺，却仍不开缺出使大臣，随时准备出使。至此，开缺其官，而不准其归，他才知道自己求退是没有希望了。

郭嵩焘坚决求退，似乎对出使英国并不热衷，甚至避之唯恐不及。在推避不了之后，又感十分怨恨，责怪沈桂芬的“悔弄”，斥其“居心险狠”。此一态度出在他日记之中，并不像后人所谓“毅然出使英国”的描述。

1876年9月6日，慈禧太后再度召见郭嵩焘。从召对中可知，慈禧颇倚重于他，慈禧劝郭嵩焘“此时万不可辞。国家艰难，须是一力任之。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，此事（出使）实亦无人任得，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”。慈禧深知郭嵩焘的处境，所以她劝郭嵩焘：“旁人说汝闲话，你不要管他。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，全不顾事理，不要顾别人闲话，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。”慈禧还要郭嵩焘继续赴总署上班，说是“尔须天天上总理衙门，此时烟台正办着事件，时常有事商

量，你必得常到”。此外也问到他的身体情况。太后的诚恳相劝，终于使他完全打消了辞意。

远洋西方

1876年7月19日，太后召见之后，郭嵩焘重返总署，协助处理外交事务，恭亲王也颇为倚重，常与会晤。8月初二又授礼部左侍郎，到礼部去办公，但他主要的任务仍然是积极准备出洋。在出洋的前夕，英国公使威妥玛再度展露帝国主义者的本来面目，以凶狠的脸色，逼问郭嵩焘的行程，使他深切地体会到弱国无外交的苦楚。

郭嵩焘于1876年9月15日，根据上谕，提出了出洋随员，以张自牧（后未成行）与黎庶昌为参赞，德明与凤仪为翻译，汪树堂、张斯杻、李荆门、罗世琨4人为文案。当日太后再次召见，实际上是辞行。除答问行程外，太后再度说：“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，不可倾听外人言语，他们原不知什么。”郭嵩焘忍不住说：“不知事小，却是一味横蛮，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！”他所指的是8月中旬，在湖南老家所发生的威胁事件。湖南乡试诸生痛恨洋人，力抵郭嵩焘，聚集在玉泉山，要捣毁上林寺以及郭家的住宅，使郭氏一门受惊不小。太后听后，也只能抚慰而已。郭嵩焘出洋，不仅要看帝国主义者的脸色，而且还要看自己老乡的脸色，这让他从一开始就领略到了此行之艰难。

9月25日，郭嵩焘天未亮就料理行李起程。29日到天津见李鸿章。10月1日登海轮“丰顺”号，与马建忠同船南航。次日经烟台南驶，在黄海上遇到大风，风雪交加，郭嵩焘一家都支撑不了而呕吐。10月4日中午到达吴淞口。英使威妥玛已在上海等候，其他各国领事也一一来见。8日，副使刘锡鸿以及其他随员也相继到沪。